

回鹘文译本《玄奘传》传扬丝绸之路文化精神

□ 姑丽尼格尔·艾斯卡尔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由玄奘法师弟子慧立与彦惊根据玄奘口述而撰写的法师传记，成书于唐垂拱四年（688），凡十卷。前五卷由慧立撰，主要记述玄奘出生、出家参学、西游行程及印度半岛各地游学经历，可与玄奘所著《大唐西游记》互相证补；后五卷则由彦惊撰，记述法师返回长安后的译经事业。该传记是我国现存的、保持完整面貌的最早的一部中篇单行个人传记，也是研究中亚、印度及丝绸之路各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社会风情的珍贵史料，可谓传扬丝绸之路文化精神的不朽之作。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高度评价玄奘法师：“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玄奘法师的西行东归，铸就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引发后人无数评说。弟子们说他是“佛宗之法将”，鲁迅称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梁启超尊他是“千古之一人”。

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友好相处，频繁地进行经济与文化交流，都为创造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了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各民族之间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互相学习，彼此帮助，取长补短，汉文化高度的发达就吸收其他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其他民族也将大量汉文作品翻译成各民族文字而加以利用，汉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被胜光法师翻译成古代维吾尔文一回鹘文，就是其中生动的例证。

近代以来，西方探险家们在新疆吐鲁番和敦煌藏经洞等地发掘出大量回鹘文文献，其中以宗教文献居多，此外还有社会经济文书和众多文学作品，由此可进一步证明，高昌回鹘王国曾使用回鹘文翻译了大量典籍，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即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1927—1935年，由中国和瑞典两国组成的中瑞西北考查团，在新疆工作期间收集到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文物，曾对新疆考古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就在这支中瑞考查队之中。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930年左右在新疆出土之际，即被人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清华大学教授袁复礼，即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之弟协助图书馆购得，计240叶；一部分归法国东方考古学家海金（Joseph Hackin），计8叶。此外法国吉美博物馆存123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存97叶。

国家图书馆原藏的240叶于1932年借给德国学者冯·加班（1901—1993）研究。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抗战前和抗战初期曾多次去函催还，但均无下文，直到抗战胜利后得以完璧归赵，并且连海金收藏的8叶也一同归到北平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现藏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248叶，十世纪写本，长43.0厘米，宽18.0厘米，梵夹装，麻纸，纸呈黄褐色，双面书写，每面27行，四边刻划有红框线。

在每叶的第5至9行之间有圆圈，直径约4.9厘米。圆圈中间有绳孔，每叶左边用小字回鹘文注明页码，现多残损。此文献不仅独具文物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与艺术价值，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2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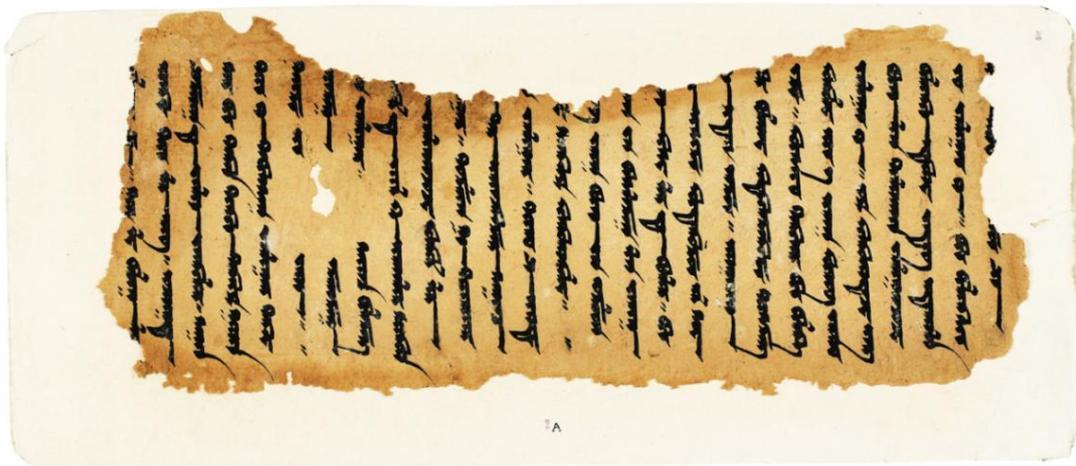


图1 回鹘文译本《玄奘传》传扬丝路文化精神

《玄奘传》的回鹘文译者是中国古代著名翻译家胜光法师（Singqu Sali Tutung），也称僧古萨里，相传生于新疆别失巴里（Bishbaliq，遗址在今乌鲁木齐北吉木萨尔县城附近）。根据回鹘文《玄奘传》写本的字体以及写本中出现的t和d、s和z字母替换使用等情况，多数学者认为该书翻译年代应在元代以前。由此推之，胜光法师大约生活在北宋时期（960—1127）的高昌王国初期。胜光法师精通汉文、梵文、龟兹文，先后从汉文翻译了《金光明最胜王经》《玄奘传》《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观心经》等佛教经典，可谓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使者。其译文语言流畅，词汇典雅，既准确再现原文精义，又熟练运用本民族语文而确保译文易于理解和传播。其所翻译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另一重要译著《金光明最胜王经》，对于研究古代回鹘文、中亚佛教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古时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的宗教有景教、摩尼教和佛教等，这些宗教都曾为回鹘人所崇奉。景教和摩尼教的传播区域与流行时间相对有限，只有佛教在该地域一直兴盛至十五世纪。与此相应，目前所见的绝大多数回鹘文残卷内容均与佛教有关，而景教和摩尼教文书则为数不多。不过，相较其他民族文字古籍，现存回鹘文文献仍属稀少，其中绝大多数为断简残篇。对此，恰如西域语言文字专家耿世民先生所言：“由于历史的原因，回鹘文佛教典籍曾遭到大规模、有意识的销毁，现今存世的文献稀少，且多为零简碎篇，研究十分困难。”由此，这部回鹘文《玄奘传》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成为我们研究古代维吾尔族语言演变和宗教发展的基本史料之一。同时，由于当时的汉文佛典对梵文佛经中有关印度、中亚地区人名、地名词汇的译文并不完全准确，回鹘文《玄奘传》正是考证相关名称和各种术语的重要文本依据。鉴此，回鹘文《玄奘传》遂成为国内外回鹘文学者的研究热点。1951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员与王重民、季羨林先生接洽回鹘文《玄奘传》影印事宜，他们商请冯家昇先生来整理编排。冯先生征得郑振铎先生同意，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把这项工作完成。

早在一千多年前，汉文《玄奘传》《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典籍被一位古代维吾尔族学者译为本民族语言，丰富民族文化宝库，使这些汉文典籍在民族地区得到推广、传播，并非偶然的。历史上有不少新疆兄弟民族人士精通汉文，其中有的并能用汉文写作，龟兹（今库车）

人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到内地，译佛经为汉文达三百多卷；唐代疏勒（今喀什）人裴惠琳（公元737—820）用汉文撰写《一切经音义》一百卷；龟兹人利言撰有《梵语杂名》一部；生活在9世纪上半期的坎曼尔不仅熟读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作品，并能用汉文写诗，其写的《忆学字》一诗中生动感人地描述了他家祖孙三代学习汉语文的情况。他们是丝绸之路上，多民族文化的传递者、文明种子的播撒者。近代新疆各地出土的译自汉文的回鹘文残卷如《易经》《左传》《论语》以及许多译自汉文的佛经，是自古以来祖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互相依存、彼此借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平等互助、友好相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悠久文化传统的必然结果。